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 现实挑战与范式革新^{*}

张树辉 李镕成 张润泽

【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推动了观念革新和社会变革，网络意识形态格局在智能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嬗变与重塑，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研究发现，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虚假风险、偏差风险、隐匿风险、解构风险四重挑战。构建“五维协同”智能治理创新体系，形成“技术赋能—价值引领”双向互动机制，是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实现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人工智能 高校意识形态 智能治理 五维协同

【作者简介】张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文明与智慧决策实验室主任；李镕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润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文明与智慧决策实验室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5) 06-0077-17

自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全民化的移动互联网以其信息资源的丰富性、传播机制的高效性、交互方式的扁平化成为意识形态萌发和传播的重要

^{*} 本文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一般项目“基于混合智能技术的北京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受众意识形态计算模型研究”(BJSZ2023YB60)、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级年度科研项目“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思想动态观测管理与信息机制创新综合研究”(X20250002)的阶段性成果。

场域。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多元社会思潮激烈碰撞,给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新形态,正在重构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以 ChatGPT、DeepSeek 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不仅进一步加大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互联网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意识形态工作与高等教育事业均承担培根铸魂的重要使命,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只有打好青年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攻坚战,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好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关于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趋势,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②这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工作者深刻把握在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形势与新规律,主动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推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阶段。本文旨在探究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运行规律,系统分析在青年学生深度参与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风险,进而提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智能治理新范式。

一、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格局的嬗变与重塑

受到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相应的转型与变革。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驱动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社会变革,给人们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带来巨大冲击,导致网络意识形态格局发生深度嬗变。

(一)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

在传统意义上,主流意识形态须由国家主导确立,国家通过宣传教育、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 《习近平向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人民日报》2024年11月21日。

话语构建、文化建设等方式引导社会公众形成相对固定的思想体系，由此产生在全社会具备高度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ChatGPT、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凭借出色的数据处理和语言生成能力，正迅速成为认知战的核心力量。^①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利用其自然语言处理与数据分析功能，迅速获取知识加工和信息传播的“话语权”。GPT-4等国外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包含大量受西方价值观主导的文本内容，其算法逻辑天然地嵌入了“西方中心主义”之类的偏见。受到算法、训练样本和人工调整参数的影响，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显现价值观念偏好，生成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文本、音频和视觉产品。

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网络舆论场“既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也有人与被人操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之间的争夺”。^②在当前国内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社会时评和新闻媒体选择运用人工智能从事内容创作和视频生产。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或加工的资讯早已超出单纯的新闻报道和知识总结范畴，常常夹杂人工智能生产者和操控者的观点和偏好。而作为互联网主体的人，在使用人工智能加工、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机器生产的知识和观点。如果我们将知识、话语、叙事视为一种权力，那么帮助我们从事知识生产、话语传播和叙事建构活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具备了参与塑造人类意识形态的“准入资质”。

（二）技术综合应用丰富网络意识形态的感知场景

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领域实现了全面进步和突破，形成了网罗多个领域前沿关键技术综合体系。智能信息技术群不仅为各类网络思潮创造了多元化的载体平台和多样化的展示场景，而且不断探索在情感表达和价值取向等层面贴近人们的感知体验。人工智能在现实世界或虚拟空间的应用中叠加了单一技术的场景编织能力，发挥了智能技术的“综合效应”，如在万物互联背景下民用电子设备中深度学习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叠加，以及在网络直播中虚拟现实技术和数字孪生技术的叠加。技术在人与社会产生联系的过程

① 参见曾庆鸣、毛维准：《认知武器化与人工智能认知战——一项机器学习与行为实验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5期，第49~80页。

② 向征：《“黑镜”中的对垒：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与防范》，《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4期，第19页。

中不再只是充当“工具”，而是通过“互动”识别、解读人的情感意图。相关研究表明，网络用户特别是青年群体“在意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所处的场景”。^① 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人追赶和学习技术”向“技术学习和追赶人”的转变。技术综合体塑造和传播的文化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生动、拟真，对网络社会参与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更具冲击力。

（三）多元文化群体争夺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

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② 政治主张、思想论断和学术话语等意识形态依托大众媒介进行传播，传播媒介时效性、覆盖性和便捷性的每一次进步都带来了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震荡。人工智能时代的大众传播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效率，扩大了人们信息传递与交换的范围，帮助人们快速结成兴趣相近、取向一致的趣缘群体，这些社群通过构建自己的符号体系、价值观念与表意方式，创造了特征鲜明甚至具有虚拟共同体意识的网络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绝对同质性和高度封闭性的网络群体并不存在，任何新媒介的加入都可能使原有群体产生隔阂、分裂，重塑网民个体的自我认知，从而形成开放、多元且碎片化的网络意识形态秩序。此外，高质量、沉浸式的网络社会参与体验打破了人们理解其他人类文明资源的时空限制，使其他社会的精神文化成果更容易介入、影响和分化当前的网络群体。依托智能传播技术崛起的虚拟“文化部落”，正在一定范围内同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空间。

（四）市场配置资源助推网络意识形态的无序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互联网生产的文化产品大多以营利为目的。然而，这些文化产品传播的广泛性和视听的便捷性使之在发挥经济功能的同时，深刻影响了社会价值观念和舆论生态。这意味着网络文化产品兼具商品属性和

① 廉思：《用“场景革命”打赢意识形态的“不对称战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年第2期，第19页。

② [英]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铨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价值观念属性，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网络媒体承担经济主体和价值传播者双重角色。虽然网络空间创造了非实体的社会形态，但是网络文化产品的价值引导功能仍应居于商业逻辑之上。在市场“无形的手”推动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互联网市场是“流量”的市场，网络文化产品资源消耗率低、经济附加值高，区块链、边缘计算、Web 3、云服务等具有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特征技术的应用有效杜绝了网络文化产品的垄断式生产，吸引更多网民成为网络信息市场的供给方以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网络信息的供给方和网络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在争夺流量的同时，也在争夺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只有获得并不断巩固消费者的价值认同，才能避免在高速迭代中被“划过”“刷走”，这就导致虚拟社会中的观点碰撞、思想交锋愈发复杂激烈，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加剧，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呈现互动特征：一方面，算法技术通过内容生成和推荐机制重塑网络意识形态生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通过政策规制、价值引导为技术的应用划定边界，如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这种“技术赋能—价值规制”动态平衡关系，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底层逻辑。

二、人工智能对高校抵御意识形态风险提出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②要长期确保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必须培养青年一代真心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然而，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易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思想渗透和分化瓦解的重点对象，^③高校作为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的前沿阵地，历来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镇。在人工智能时代，面对青年师生思想日益活跃、社会思潮加速碰撞、自媒体发声更加主动频繁的新态势，精准识别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系统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显得极为重要。

① 参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752.htm，2025年4月30日。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③ 参见王建南：《加强高校党委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三个着力点》，《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4期，第27~30页。

（一）科学的意识形态观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前提

意识形态观既包含一定阶级运用其思想体系在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形成的根本观点及创造的精神生产资料，即世界观的意识形态；也包含运用意识形态充当认识和改造社会存在的思想武器，即方法论的意识形态。^①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在发展中被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实践检验过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期，西方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试图借助新媒体和新技术打通传播渠道，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制高点。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刻意迎合青年群体的批判精神和个性表达，实则夹带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适配的错误价值观念。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对广大青年提出了“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②的希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顺应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趋势，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意识形态工作，将人工智能融入意识形态工作实施与评价的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能力，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确保高校始终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培养时代新人的坚强阵地。需要警惕的是，要避免出现对青年学生的世界观建设落后于方法论教育的情况，即重知识传授、轻价值观教育的人才培养错位，一旦用技能教育替代“三观”教育，很容易培养出精于算计的功利主义者，而非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③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深刻表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

① 参见吴恒：《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百年流变的哲学意涵》，《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16~22页。

②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思想演变是一个长期的代际过程，人工智能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加大了代际差异，这种差异积累到一定程度易引发思想观念的隔阂，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冲突。^①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其中30岁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约30%。^②“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青年人被称为‘数字原住民’或者‘数字一代’”，^③网络和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凭借天然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探索世界，并在不经意间接受着通过数字化产品渗透的意识形态。

高校学生群体不仅能熟练运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而且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对各方面的信息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这使他们乐于运用“批判的武器”与自己不认同的社会现象针锋相对。与青年学生朝夕相处的高校教师是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样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通过著述、授课、讲座等形式发表自身观点，扩大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部分基础学科及绝大部分应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响，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外在表达。话语构建依托于学科建设，从而使话语具有学理性的逻辑表达。没有深厚学术内涵的话语体系，会使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失语’，受到西方价值和思潮以学术为介质的话语冲击，甚至出现意识形态安全问题。”^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任务，高校这个意识形态重镇一旦失守，可能成为危害国家各领域安全的“决堤口”。

（三）人工智能给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

① 参见李学勇、林伯海：《思想政治教育的代际维度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年第19期，第15~18页。

② 参见《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cnnic.cn/n4/2025/0117/c88-11229.html>，2025年4月30日。

③ 王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0年版，第82页。

④ 丁晓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http://www.jyb.cn/rmtzgjyb/202504/t20250403_2111327102.html，2025年4月29日。

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① 因为精准识别风险挑战的源头和表现形式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前提,而高等教育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又享有特殊地位、承担特殊使命,所以需要同时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性质特点和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隐患所在。

1. 虚假风险:信息的真实性面临挑战

马克思反复指出要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从地上到天上”建立物质的意识和科学的观念,而虚假的意识形态则“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从幻想的观念出发”,“以观念代替现实”。^② 这种情况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愈发复杂。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生成技术能以极快的速度生成高度逼真的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多模态内容,其真实性往往难以分辨,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构成了潜在威胁。与“象牙塔”外的社会公众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性认知不同,青年学生群体更倾向于通过观念来认识和评价世界。当网络空间成为学生了解社会和表达观念的“物质”基础时,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被误认为可信的社会现实,从而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判断。长期处于这类信息环境中,青年学生可能逐渐对现实社会形成误解和偏见,甚至产生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倾向,进一步加剧对社会制度的质疑和抵触心理。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虚假信息传播中的应用,显著增强了虚假宣传的隐蔽性和渗透性。借助深度学习算法,人工智能可以模拟音视频并进行伪造,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具有极强的欺骗性。^③ 例如,深度伪造技术能精准模仿政治人物或权威人物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虚构历史事件,误导学生对现实社会的判断,进而削弱其对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

2. 偏差风险:认知观念的准确性面临挑战

受到认知能力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人们自然地存在认知偏差。这种知觉失真的现象在社会经验相对匮乏、生活空间相对封闭、价值判断标准尚未完全成熟的高校学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互联网的信息集成度和透明度曾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9页。

② 侯惠勤:《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之判断与当代意识形态之争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6页。

③ 参见王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8页。

被认为能有效矫正认知偏差，现实情况却表明，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偏差带来的风险不降反增。通过深度学习用户行为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推荐算法能为用户提供高度定制化内容。然而，这种算法并不透明，其优化目标通常是最大化用户的点击率或页面停留时间，而非传播真实客观或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主流意识形态作品在算法逻辑中很容易被边缘化，而某些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极端立场或煽动性的内容因其强刺激性和话题性，可能被算法优先推送，诱导学生偏离主流价值观。同时，算法不断给个体推送主题和内容相似的信息，用户被禁锢在“信息茧房”和网络“回音壁”中，这会导致人们更倾向于听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声音，并且在算法建构的认同幻觉中不断深化既有偏见。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信息过滤机制，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虽然个体的认知偏差并不直接危害意识形态安全，但是青年学生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表达意愿，其个人偏好往往在群体生活中获得认同。一旦群体内偏见叠加并导致负面信息过剩，群体认同很可能演变为群体极化，对主流价值观构成挑战。青年学生亟须接受主旋律的引导和辨识能力的培养，在智能技术滥用和群体极化风险的双重作用下，高校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将会面临学生理想信念动摇、真理追求弱化的严峻形势。

3. 隐匿风险：舆论监管的可控性面临挑战

在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可控性挑战主要来自互联网与智能技术的去中心化及自适应性特征。这使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对的信息内容从传统的有限来源与单向传播方式，向多元化、碎片化、自发性传播转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真伪难辨的特性，使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倾向的内容难以被准确识别，而去中心化的内容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大学生群体消极的“自由平等”观念的蔓延，极大提高了高校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管理难度。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加密技术的支持下，匿名的网络空间大大降低了网络行为的成本，这导致猎奇、吊诡、激进、违禁的网络产品以及“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的消极观念迅速传播。这些观念恰好迎合了部分青年学生的好奇、好胜和逆反心理，致使他们更易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从而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构成挑战。另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还面临一种隐匿风险，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潜藏的偏见问题。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主导权仍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大模型主要基于英文语料库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有西方价值

观和意识形态,呈现“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黑箱”特性又进一步嵌入了设计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从而使生成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①特别是在涉及敏感议题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偏见可能被放大,对学生的价值观和认知产生潜在影响。

4. 解构风险:理想信念的向心性面临挑战

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得益于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呈指数级增长,其带来的信息碎片化正在分割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致使个体价值观被重新塑造,同时也重新界定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范围。“精致的利己主义”等行为倾向和“奶嘴乐”等浅薄娱乐文化逐渐向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使青年学生面临信仰迷失、价值观错位、社会责任感降低等诸多问题。智能信息技术既削弱了高校对学生价值观的正面引导,也给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的驱动下,这些渗透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防范。境外势力通过分析用户数据定制信息内容,将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观点进行巧妙包装,再通过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平台等渠道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需要警惕的是,西方敌对势力针对我国网民,特别是青年用户输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世界的社会现实并不相符,而是想象中的“个人权利至上”,它在理论上看似具有正义性,在实践中却充满了虚假性,会诱导青年学生对这种虚构的价值正义狂热崇拜,弱化其对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认同。“躺平”“内卷”等网络流行语传递的情绪,是社会黏性减弱、利益竞争加剧的结果,也反映了当代青年学生在价值观重构过程中的认知困境。在这一过程中,部分青年学生对融入社会的热情逐渐减少,对网络的依赖则愈发加深,这种“去社会化”的成长轨迹可能削弱青年一代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公民意识,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更加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三、以智能治理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范式革新

在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给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多层次全新挑战的同时,我们要善于把握和运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

^① 参见王延川、赵靖:《生成式人工智能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逻辑机理及其应对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7页。

成果，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意识形态工作，构建“五维协同”智能治理体系，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确保高校始终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培养时代新人的坚强阵地。

（一）技术赋能维度：构筑智能治理的基础支撑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之一，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良好机遇。人工智能技术以大数据和算法为基础，能动态捕捉并回应学生的认知和情感需求，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控性。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抓住这一契机，实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智能技术赋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数据分析、智能交互、内容生成和资源优化等方面的潜力，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可以尝试构建“技术治理+价值引领”的双重逻辑框架，通过这种耦合机制，突破传统治理理论中“技术万能论”或“价值独断论”的局限，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分析—价值校准—效果评估”的闭环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能从精准化、智能化和动态化三个层面赋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在精准化方面，依托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文本分析等技术手段，对高校学生群体在网络平台中的行为、言论等进行观测，形成反映个体需求与思想状况的学生画像。基于这些画像，智能推荐系统定向推送优质教育资源，使主流价值观传播更加贴近学生、深入人心。在智能化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构建自然语言交互的教育平台，如智能问答系统或虚拟校园助手，为学生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提供权威解读和学习支持。例如，有的高校与认知智能大模型设计团队合作，利用大模型技术开发思想政治教育智能辅导系统，基于海量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数据进行训练，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学生的问題，并给出专业、全面的解答；有的高校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微信小程序，学生可以在小程序中输入自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或疑问，小程序通过智能分析，指出学生的理解偏差，并提供正确的解释及相关拓展知识。在动态化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对學生思想动态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及时发现学生个体和群体的思想观念变化趋势，自动检测和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潜在风险，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

增强人工智能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技术赋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一是建设智能校园意识形态工作生态。构建包含识别、分析、供给、施策全流程的智能化链路,^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和精准度,同时开发监测工具用于过滤虚假内容。二是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治理。对平台与技术的内容治理要遵循立德树人的基本逻辑,确保数据来源、知识库建设和算法优化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通过人为干预优化算法学习素材,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数据库、知识库纳入国产大模型训练。三是完善相关管理规范。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使用规则,确保技术应用始终安全、可靠、可控,避免因技术的滥用导致意识形态传播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

(二) 价值引领维度: 提质意识形态的导航系统

高校不是远离社会的“避风港”,而应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策源地。高等教育要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有用人才,须始终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前沿,充分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网络强国、区块链技术、量子科技、数字经济等科技创新主题开展了多次集体学习,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学习是教育工作者的终身课题,高等教育始终处于社会发展变革的风口浪尖,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时刻具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如果我们稍有懈怠,便会陷入能力不足的困境,成为新潮技术的“门外汉”和学生眼中的“老古董”。高校教育工作者还应认识到,数字技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迭代极快,这要求我们不仅不能落后,而且要时刻领先,以强烈的兴趣、包容的态度和奋进的状态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

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意识形态工作提质升级:人机交互的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主体性潜能;人工智能的生成性特质能带来内容生产的互动融通;人工智能作为技术中介能实现教育资源的盘活与创新。^②这体现了人工智能从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三个层面赋能教育的重要作用,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加高效系统、更加注重个性

① 参见万光侠、焦立涛:《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向度》,《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第38~43页。

② 参见冯琳、倪国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第46~53页。

化和过程化。^① 通过将人工智能融入意识形态教育，高校教育工作者能更加灵活地调整教育策略，开展针对性强的思想引领活动，有效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如此一来，高校就能构建以技术支持为基础、以学生主体性为核心的新型教育体系，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增强对智能技术的学习内驱力，将技术新潮与意识形态工作深度融合。一方面，要提高对智能技术的学习意识，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是教育领域不可忽视的变革力量，学习其核心原理，强化理论认知，并在具体实操中掌握技术应用。另一方面，要树立人机协同的教育理念，尽快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全流程实现传统思政和智慧思政的整合。在教育环境、教学方式与教学评价等各方面结合智能技术进行革新，提高人机协作意识和内容创新自主性，开展个性化教育。例如，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借助多智能体技术构建了高度仿真的教学场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三）主体能力维度：优化师生数字素养的提升路径

社会思潮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局面，集中反映了特定群体的关注热点和思想状况。社会思潮具有思想理论倾向，往往能反映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知和诉求。^② 当今时代，网络已经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主阵地，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则进一步扩大了网络社会思潮涌流的覆盖领域和受众范围。网络不仅为各类社会思潮提供了传播扩散的生存空间，而且是其争夺话语权的工具和扩大影响力的阵地。在人工智能时代，单纯依靠技术手段阻遏社会思潮传播已不足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从政治层面研判形势、分析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把握方向、辨别是非。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思潮，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判什么”的问题。当代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包括民粹主义、商品拜物教、

① 参见燕连福、秦浦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与对策》，《广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第201~206页。

② 参见林泰、蒋耘中：《社会思潮概念辨析》，《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第44~46页。

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等,^①这些错误思潮往往具有谱系复杂、西方色彩突出、政治诉求明显的特点,通过伪装成学术研究或多元文化主张的方式捏造“正当性”,对高校青年群体价值观具有较强的扰乱和迷惑作用。^②一些从西方输入的错误思潮往往涉及政治体制、社会道路、文化规范等问题,部分青年学生因缺乏判断力而成为其“受害者”。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梳理网络社会思潮产生的历史经纬,评估上述错误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尤其要关注其对高校学生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意识形成的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及时发现并帮助学生规避错误思潮影响。唯有成为政治自觉头脑清醒的“明白人”、帮助学生明辨是非的“引路人”,方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前线“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例如,有的大学开展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主题教育,展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社交媒体算法推送带有偏见的信息进而误导学生对国际事务认知的典型案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辨别能力,透过学术讲政治,使其自觉抵御不良思想的侵蚀。

当代社会思潮呈现传播主体下沉、传播结构多中心化、传播形式碎片化与符号化等特点,^③加大了识别和分析的难度。人工智能技术为网络社会思潮的分析和监测提供了全新的工具。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可以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实时监测网络社会思潮的动态演变,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讨论内容的主题、情感倾向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充分利用智能工具,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能更精准把握社会思潮的传播规律与影响范围,在复杂多变的网络传播环境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四)文化生态维度:探索青年亚文化的引导策略

青年一代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科教文卫、国防军事等领域发挥

① 参见李慕:《当代社会错误思潮影响青年学生的内在逻辑及其应对策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49~156页。

② 参见郑晶晶:《新时代科学研判社会思潮演变的逻辑理路》,《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85~92页。

③ 参见王炳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发展及演变趋势》,《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第75~87页。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00后”“05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最高，他们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创造着具有独特身份标识的符号体系和价值观念——被学界称为青年亚文化。而移动互联设备和智能信息技术又是青年最常用的创造亚文化的载体，以互联网技术为主的新兴媒介推动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加强对亚文化等青年文化热潮的关注和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青年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与自我定位。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关注青年群体在文化创新中的主体性，尊重并鼓励其多元化表达。同时，也须积极探索如何引导亚文化与主流价值观良性互动，使之成为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向力量。

关注青年文化热潮需要超越表面现象，深入挖掘其背后折射的社会心理结构、社会情绪和价值态度变迁。网络流行用语反映了青年学生的行为模式和价值选择，意识形态工作者需要从“躺平主义”等网络热词中看到其背后的“社会脱嵌”的表征，并着力化解其消极影响。^① 青年亚文化圈层如二次元文化、潮玩文化、电竞文化、说唱文化等，展现了青年对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和自我表达的渴望。这些文化潮流通常具有小众性、边缘性和娱乐性等特点，通过独特的符号系统和文化实践形成与主流文化相异的表达。^② 意识形态工作者需要对网络热点保持敏锐度，理解青年的兴趣爱好、社会关注与自我展现方式，并从中洞察其隐性价值倾向与发展诉求。

面对青年亚文化，意识形态工作需要从传统单向灌输转向平等对话与引导，以尊重和共情的态度理解青年群体。事实证明，“说教式”的教育手段可能加剧文化裂变的风险。要深入了解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方式，将文化热潮中流行的表达形式、青年关注的热点话题融入主流价值观教育。例如，有的高校搭建了“智慧思政大数据平台”，运用情感分析和语义挖掘技术精准判断学生的情绪倾向和思想关注点，及时为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并为学生推荐适配的学习资源，如给对时事政治关注度高的学生推送最新的政策解读文章和深度分析报告。

① 参见令小雄、李春丽：《“躺平主义”的文化构境、叙事症候及应对策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24~139页。

② 参见孙伟平、伏志强：《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及其治理》，《江海学刊》2024年第4期，第157~163页。

（五）舆情治理维度：健全网络空间的动态平衡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① 青年学生有时会对身边违背价值正义的现象抱有极大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提出尖锐甚至偏颇的批评，一些“小事件”很容易演变为“大舆情”。近年来，实名呼吁和匿名宣泄双轨并存已经成为高校舆情的显著特征之一。微博、微信等公共社交媒体平台大多被主流舆论占领，而网络树洞、匿名论坛等隐性空间则越来越被一些青年学生视为“精神避难所”。个别学生肆无忌惮地借助网络匿名“保护伞”，表达情绪先行、理性缺位、道德失范的个性化欲求。疏解群体情感宣泄带给学生的虚假共鸣，需要意识形态工作者主动关注层出不穷的青年舆论场，严格把控网络舆论暗潮，疏解青年学生可能存在的压迫感、焦虑感、落差感和剥夺感。

高校舆论生态呈现高复杂性与高动态性的特点。一是舆情发酵平台多元，不仅包括校园BBS、论坛等校内交流平台，而且涉及微博、知乎、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校外互联网平台。舆论议题可能跨平台传播，导致校内外舆论主体交织互融，加剧舆情复杂化演变。二是舆论议题涵盖广泛，涉及社会热点、价值观念和校园治理等多领域内容。其中，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议题，如校园安全、学生权益保障、突发公共事件等易引发舆论热潮，激起强烈的情感反应。总体而言，高校网络舆情可分为交流、求助、意见和发泄四种类型，^② 常表现出事件突发性、传播裂变性及发展不稳定性的特点，需要格外予以关注。

增强对校园舆情的疏解把控力既是化解冲突、维护校园稳定的关键，也是引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导向的重要实践，需要技术支持与机制创新并举。一方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动态监测热议话题与传播趋势，及时掌握风险点，为高校舆情疏解提供科学依据。高校可以建立舆情态势感知系统，实时跟踪高风险舆论事件，在舆情扩大或产生“次生危机”之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例如，有的高校建立多模型协同不良信息识别系统，通过

①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② 参见李桂平、程海威：《5G智媒时代高校网络舆论传播的生态嬗变与多维应对》，《情报科学》2023年第2期，第143~149页。

对网络流量的实时监测和分析，运用深度学习算法识别异常流量和攻击行为。另一方面，要搭建师生沟通渠道和意见反馈渠道，通过建立线上匿名反馈机制和开办线下座谈会，鼓励学生围绕校园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降低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宣泄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工作者须对学生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出及时处理并公开回应处办结果，形成透明互信的沟通机制。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①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信息时代，高等教育须同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战略性技术既紧密结合又划清边界，坚持激浊扬清的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深刻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格局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构效应，智能技术的算法权力属性正在重塑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底层逻辑，既带来传播效能的提升机遇，也会引发认知偏差风险与价值渗透危机。

在数字文明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呈现“技术治理”与“价值引领”的双重逻辑。这要求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在发挥技术赋能优势的同时，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通过构建算法伦理审查机制与融入中华文化基因的数字话语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系统，发挥人工智能对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助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头雁”作用，在高等院校和青年学生中率先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高迎爽 何淑萍）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人民日报》2023年5月30日。

Challenges and Paradigm Shift in University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ng Shuhui Li Rongcheng Zhang Runze

【 Abstract 】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driven transformations in societal values and ideological paradigms. As the online ideological landscape undergoes continuous reshap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ur study identifies four major challenges to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risks of disinformation, cognitive deviation, concealed infiltration, and systematic deconstruc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propos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ive-dimensional synergy” intelligent governance system, fostering a dual-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value guidance”. This framework serves 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advan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and mitigate external ideological risks.

【 Keyword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deolog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intelligent governance; five-dimensional synergy

A Study on the “Testimony Law” and Evidence Presentation i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Based on the Findings from the Zoumalou Western Han Bamboo Slips

Li Junming

【 Abstract 】 The Zoumalou Western Han bamboo slips contain the earliest recorded use of the “Testimony Law” during litigation procedures, where witnesses were formally instructed under these statutes. The “Testimony Law” is a general term for legal provisions related to testimony, with detailed clauses found in the Han Dynasty’s Statutes on Judgment. In practice, interrogators would tailor their admonitions when invoking the “Testimony Law” to suit the specifics of the case. For instance, the language used in criminal cases differed from that used in economic disputes. Providing evidence i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Testimony Law”, and testimonies must include identity verification and factual statements. The main forms of evidence include self-testimony, testimony by others, and collective